

时间、空间与社会理论重构的谱系

◎ 邓万春

内容提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时间和空间入手的社会理论重构可以从重构的理论路径和内容层面两个维度去理解。在理论路径上,这种重构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条主要路径;在内容层面上,这种重构一是对空间进行重新解释,二是社会认识论再造,三是从社会空间的角度重新解释当代社会。在理论路径和内容层面交叉构成的理论网络中,呈现出社会理论重构谱系的样态。

关键词 时间 空间 社会理论 重构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7-0114-06

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建构中的空间重要性不断抬升,开始打破此前时间优先于空间成为理论建构基石的格局,学术界称之为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意味着社会理论的重构。它是对此前重时间、轻空间的社会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解释当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新趋势时面临的困境的回应。因此,社会理论的重构试图从空间入手去因应两个主要学术难题:一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问题;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变化及困境的解释。于是,社会理论重构就有两条主要的理论路径,一是注重于对当代社会进行后现代解释的路径,一是侧重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进行政治经济学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路径。又因为这两个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社会的一体两面,后者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前者是现代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多数社会理论家在从事理论重构时,都同时支应这两重任务,同时跨越两条路径。

这种社会理论重构主要是从空间入手的,因此,对空间在理论重构中的内涵、地位的界定以及对如何从空间角度去解释当代社会的思考就是社会理论

重构的内容层面。从内容层面来看,社会理论的重构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去把握。其一是对空间的重新解释:超越自然空间与绝对空间等传统空间理念,强调空间的社会性,空间与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的联系;其二是社会认识论的再造: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认识论,从社会时空角度重新建构时空辩证认识论或者三元关系认识论;其三是从社会空间的角度重新解释当代社会:或者分析当代社会空间存在的矛盾、问题,或者倡导开放的、多元的空间(社会)。虽然强调空间的重要地位,但是社会理论家们大都没有偏废时间在理论重构中的位置。

下文以列菲伏尔、福柯、哈维、苏贾等社会理论重构的主将为例,从社会理论重构的内容层面和理论路径两个维度论述社会理论重构的谱系。在叙述策略上,文章将从这两个维度交叉而构成的网络中去透视社会理论重构的谱系,在以内容层面为叙述主线的同时,兼论理论重构的理论路径。

一、空间新解

对空间的重新解释是社会理论重构的基础性工作。这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具体的路径,马克思主



义路径重视空间在现代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再生产与重组过程中的作用;后现代主义路径批判空间的权力关系、空间的封闭性,强调空间的开放性。但这两个具体路径在空间新解上的共同特点是致力于超越自然空间与绝对空间等传统空间观念,强调空间的社会性,空间与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的联系。

1. 列斐伏尔的空间新解

近代和现代的自然时空观念使得人们在很长时间内片面地以自然时空去观照社会,阻碍了社会理论家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建构社会理论。吉登斯对此有过评论。^①列斐伏尔反对纯粹自然空间的观念,他强调空间的社会性,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他认为自然空间已经消逝了,现在空间是社会性的,空间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②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实践性的,社会实践造就了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反过来又成为社会实践的条件。

在明确了空间的社会性后,列斐伏尔针对流行的二元空间观念,提出了三元空间的理念,对社会空间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二元空间观念是现代性的各种二元对立的产物。二元空间观念关注物质性的第一空间(真实的)和观念形式的第二空间(想象的)。除了这两类空间,他还提出了一种“鲜活的空间”。苏贾说“鲜活的空间,普遍认为是‘真实的’和‘想象的’两者不同剂量的单纯结合或者混合。”^③这类“鲜活的空间”就是第三元空间,它是社会实践的空间,是整合了精神与物质的空间。列斐伏尔将三元空间归纳为:空间实践(感知的空间)、空间的再现(构想的空间)、再现的空间(实际的空间)。

因此,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就兼具三种空间性,即感知的、构想的和实际的,三者平等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开放性的多维社会空间。

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路径,三元空间观念则倾向于后现代主义路径。他主要从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再生产以及社会实践的进路界定社会空间概念。而三元空间观念更多地是以现代主义中的诸多二元对立和非此即彼的封闭逻辑为标靶,对三元空间的开放性、亦此亦彼性的诠释具有

后现代主义色调。

2. 哈维的空间新解

在继承列斐伏尔三元空间划分思想的基础上,哈维将空间划分为“物质空间”、“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物质空间是经验感知的空间,空间的表征是指符号化、概念化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是指“溶入我们日常生活方式中的感觉、想象、情感和意义的生存空间”,是社会生活与实践的空间。^④他对空间的重新解释同样强调了空间的社会性,空间与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的联系。他说“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⑤这种分类从表面上看是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划分的翻版,但是和列斐伏尔强调亦此亦彼逻辑的后现代色彩不同,哈维更侧重于这三类空间的实践性及其之间的辩证关系,因而也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路径。

哈维对社会时空同样也有后现代式的回应,即“时空压缩”概念的提出。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家,他始终不忘给这种后现代式的回应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解释基础,即从资本主义由福特主义生产体制到灵活积累体制的变化来解释“时空压缩”加剧的后现代体验。

时空压缩概念既是对现代性下的理性时空观的批判,又是对后现代状况下的时空情境与时空体验的描述。他使用“压缩”这个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朝着我们崩溃了”。^⑥哈维指出,1973年以后,资本主义由福特主义体制转变为灵活积累体制,使得时空压缩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进入了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尽管如此,他反对割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5页。

②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明译,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③ Edward W. Soja《第三空间》,陆扬、刘佳林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④ 郝胤舟《“废墟中心”是一个什么空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⑤⑥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55、300页。



主义之间的联系,他强调二者之间的延续性,认为“在现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差别。”^①

3. 苏贾的空间新解

在《后现代地理学》中,苏贾对空间做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说,对空间性进行唯物主义解释的源泉,“就是这样一种认识:空间性是由社会生产的”。^②对社会空间性的肯定,打破了此前仅从物质和心理角度理解空间的传统。在社会语境中,自然空间“也是由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也会将心理空间的各种表征和意指盗用为并重塑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③

“第三空间”是苏贾后期社会理论重构的核心概念。他对于第三空间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封闭性的界说。他的叙述策略是描述性的,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第三空间的开放性拼图,他者化、差异、边缘或边界的存在使得这幅拼图总是有着新的可能性、有着新的机遇或方向,总是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因此,他说“就其最宽泛意义上言,‘第三空间’是一个有意识的灵活的尝试性术语,力求抓住观念、事件、外观和意义的事实上不断在变化位移的社会背景。”^④第三空间的开放性植根于一种亦此亦彼的开放性逻辑,它超越了对空间的“物质”和“精神”二元划分,它包含感知的、构想的与实际的三种空间性,谁也不具有内在的、先天的优先地位。

苏贾的第三空间概念过分强调空间本身的开放性、边缘性、差异性、不确定性和亦此亦彼性,而抛弃了《后现代地理学》中从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入手解释空间的马克思主义进路,倒向了后现代主义。他“还是没有挡住后现代诗性想象的诱惑:出于过分强烈地反对历史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需要,而硬地拼凑出的所谓‘第三种空间’”。^⑤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但是苏贾对于二者的对立采取的是调和的态度,他说,亦此亦彼的逻辑“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视野的一种创造性结合”。^⑥

4. 福柯的空间新解

福柯从对空间历史的钩沉中,提出了他的空间解释的核心概念——差异地点。福柯的差异地点空间观既强调了空间的社会属性,又是对空间的二元

对立性、封闭性的批判,同时又描摹了差异地点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后现代基调。

福柯认为中世纪的空间类型是层级性的、地方化的定位空间,伽利略打破了中世纪的层级定位空间,导引出一个开放性的、无限性的延伸空间。进入当代社会,基地又取代了延伸,成为当下的主要空间形式。福柯说“基地被两点或两元素间的近似关系所界定;从形式上,我们可将这种关系区分成序列的、树状的与格子的关系。”^⑦基地是一个关系空间或者关系网络。

基地有两个主要类型,一是虚构地点“乌托邦”,一是差异地点。虚构地点是没有真实地点的基地。差异地点则是一种有着真实空间的基地。差异地点有着真实空间的基础,但是又不能与真实的空间划等号,它是现实空间基础上的某种建构。差异地点“是在所有地点之外,纵然如此,却仍然可以指出它们在现实中的位置。由于这些地点绝对地异于它们所反映与讨论的所有基地,更由于它们与虚构地点的差别,我称之为差异地点(heterotopias)。”^⑧

差异地点并非一个全然开放的空间,而是具有封闭性。差异地点经常预设一个开关系统,使得对差异地点的进出都是受限制的、有条件的,例如军营、精神病院、监狱。差异地点有其社会功能。其一是创造幻想空间,以揭露真实空间的幻觉性;其二是创造另一个真实空间,以揭示我们的空间是病态的。^⑨

二、社会认识论再造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种忽视空间因素的、封闭的二元辩证法。社会理论的重构努力一方面强调了空间因素在辩证法中的

①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5页。

②③ [美]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82、183-185页。

④⑥ Edward W. Soja:《第三空间》,陆扬、刘佳林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⑤ 刘怀玉《索亚:后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本体论批判》,《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5期。

⑦⑧⑨ [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22、27页。



地位;一方面拓展了辩证法的开放性,将二元辩证法重构为三元辩证法是这种努力的主要表现。

1. 空间三元辩证法

空间视角的三元辩证法思维是列斐伏尔首先提出来的。站在开放、灵活、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列斐伏尔对各种二元对立思维(包括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简化论),进行了批判。各种二元论把意义缩减成两个术语、概念或要素之间封闭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列斐伏尔则认为始终存在着第三种可能,他力图打破这种二元关系,使其呈现为开放的姿态。^①

列斐伏尔提出了自己的三元辩证法,在二元因素之外加上一个第三化或者说一个“他者”因素。列斐伏尔将其三元辩证法作为空间分析的工具,形成空间化的三元辩证法。苏贾指出“通过对双重幻象的抨击,列斐伏尔开启了通往空间性三元辩证法的道路。”列斐伏尔始终坚持认为,思考空间的每一种方式,人类每一个空间性领域,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都要同时被看作是真实的和想象的、具体的和抽象的、实在的和隐喻的,即三元性的。^②

2. 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三元辩证法

苏贾将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发展为具体的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三元辩证法。这种三元辩证法是直接针对传统的历史性—社会性二元辩证法提出的。苏贾说“今天,一种第三存在维度正在挑战,在为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联姻注入新的思考和解释模式……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这一三面的情愫,正在带来的不仅是我们对空间思考方式的深刻变化,同样也开始导向我们历史和社会研究方式的巨大修正。”^③

苏贾对历史性—社会性二元辩证法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时间意识的拒斥,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是重构历史性与空间性的平衡的必要步骤。他说:“直截了当地对历史决定论作出批判而又不跌入简单的反历史的泥潭,这是对批判思想和政治行为进行空间化的一个必要步骤。”^④

3. 权力—知识—空间三元辩证法

与列斐伏尔和苏贾重视时间、空间、社会的平衡、从马克思主义路径重构三元辩证法不同,福柯从后现代主义路径重构了权力、知识与空间的三元辩证法。

福柯从空间中发现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从而揭示了权力、知识与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他说:通过空间,“我确实达到了我追寻的根本目标:权力与知识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关系。”^⑤福柯在空间、权力与知识的三元辩证关系中去理解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认为缺少了空间,这种关系就是不完全的。在与人类学家保罗·雷比诺进行会谈时,福柯紧紧围绕建筑学和城市规划这两个空间学科来探究空间—知识—权力三者的辩证关系。^⑥在权力、知识与空间三者中,空间是根本性的,权力与知识寄寓于空间。他说“不管在何种形式的公共生活里,空间都是根本性的东西;不管在何种形式的权力运作中,空间都是根本性的东西。”^⑦

因此,与列斐伏尔和苏贾的时间、空间、社会三元平衡辩证关系不同,在福柯的三元辩证法中,空间是根本性的因素。

4. 时间—空间辩证法

哈维是在探讨社会重建的乌托邦理想时论及时空辩证法的。他在批判空间乌托邦和过程乌托邦的基础上提出了时空辩证乌托邦,在社会理论建构中赋予时间和空间同等重要的地位。

当下存在的两种社会再建构的乌托邦是空间乌托邦与过程乌托邦。在空间乌托邦方案中,社会过程和历史、变革都被排除,社会稳定是由一种固定的空间形态来保证的。但是哈维指出,任何空间乌托邦的具体实现与被动员起来制造它们的时间过程的特性相冲突。^⑧过程乌托邦理想通常以纯时间术语来表达,空间和地点的特性完全被忽视了。但是,任何过程乌托邦理想的纯度不可避免地会被它的空间化方式所破坏。

^{①②③⑦} Edward W. Soja:《第三空间》,陆扬、刘佳林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第 77、82、3、191 页。

^④ [美]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 9 页。

^⑤ [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29 页。

^⑥ [法]米歇尔·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1—17 页。

^⑧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168 页。



空间乌托邦和过程乌托邦都失败了,哈维提出建立一种将空间和时间(过程)结合起来的时空乌托邦,他称之为辩证乌托邦。对于这种时空乌托邦的建构,他认为需要一个有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辩证法,这个时空辩证法“还必须勇敢面对唯物主义的权威和封闭问题。”^①就是说,哈维的时空辩证法要完成两个学术任务,其一是打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封闭性;其二是确立时间和空间在辩证法中的辩证、平衡地位。

三、空间与当代社会的理论重构

空间新解和社会认识论重构是社会理论重构的基础性工作,这些基础性工作从社会时间和空间入手,构建了社会理论重构的理论逻辑。社会理论重构的落脚点是思考与解释当代社会,因此,建构这些理论逻辑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这些理论武器去回应当代社会。

1. 空间生产

列菲伏尔从空间生产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现状与内在矛盾,并提出了化解矛盾方案,即倡导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空间。

从他对社会空间的理解出发,他指出空间生产是对空间本身的生产,反对把空间生产狭隘地理解为空间中物的生产,空间生产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②空间生产指空间生产社会关系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列菲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模式中,空间与商品、货币和资本一样有相同的特质,社会空间就既是生产力、生产资料,又是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了一个与时间相分离的抽象空间,它和政治、权力和经济网络联系在一起,成为国家的政治工具,现代国家掌控下的空间是典型的阶级空间。^③

这种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存在着内在的矛盾。矛盾源自空间生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冲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需要对空间进行普遍性、均质化的生产。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了空间的碎片化和对空间使用的特殊性、断片性。^④这种冲突导致了资本主义空间的矛盾、混乱状态。

面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矛盾,列斐伏尔展望了社会主义的空间。资本主义空间是一个商业空间

(经济空间)、警察空间(政治空间),是一个倾向于消除差异的均质化空间。社会主义空间则是一个充满差异的空间。他区分了“对自然的支配”与“对自然的取用”,并以此为基础分析空间生产方式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资本主义空间到社会主义空间转变,意味着空间由被支配到被取用的转变,意味着将使用置于交换之上。^⑤

列菲伏尔的解释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式的,但是仅从均质与差异、支配与取用方面去理解资本主义空间与社会主义空间的差别又有些许后现代的色彩。

2. 全球化与身体

哈维将全球化这个最宏观的空间和身体这个最微观空间辩证地联系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与局限,并从这种矛盾的全球化空间和身体空间中看到了替代性的进步政治的希望。

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由两个基本的部分构成,一是“空间规模的生产”,一是“地理差异的生产。”^⑥这二者都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策略。但是这二者间也存在矛盾。特定空间规模层次上的地理差异是资本主义空间规模生产的动力,但是资本主义空间规模全球化的趋势与特定空间规模上地理差异的地方性、特殊性诉求常会发生冲突。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面临的矛盾。

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看,这种矛盾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哈维以一种辩证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矛盾,在批判之外也赋予这种矛盾解放政治层面的积极意义。他说“保持差异的权利对抗着权利的普遍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认为这种两难困境是不能超越的。”^⑦因为这种矛盾为替代性的进步政治提供了契机。

身体被社会所建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身体卷入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在资本循环和积累的过

①⑥⑦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190、71、88 页。

②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33 页。

③④⑤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49-50、51、55 页。



程中,全球空间与身体空间联系在了一起。哈维说:“工人必须使自己的身体每天都劳动”,但是,“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被卷进了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过程中,这个过程轻易地避开了局部劳动市场的时空约束,并导致世界舞台上的资本积累。”^①于是,在一个全球化规模上确定的时空性与在一个地方化规模上运行的身体就相互交叉了。

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身体空间与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全球空间也存在复杂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工人的身体在资本循环和积累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被动性,是资本的附属物。但是另一方面,一种身体的政治学表明,工人的身体也是“政治抵抗的场所”。劳动者“在资本循环过程中体现为一个政治人”:要求从资本循环的嵌入性中解放出来;要求在循环过程中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②

3. 空间与权力

严格地说,标题应该是空间、知识与权力,空间与知识共同建构了权力,权力反过来滋养空间与知识。但是福柯认为,空间是根本性的,所以这里着重论述空间与权力的关系,但是这二者的关系背后都必然地隐含着知识要素。福柯对当代社会空间与权力关系的分析是后现代立场上的现代性批判与解构。

福柯视空间为权力运作的基础。他说“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③从18世纪起,建筑跟政治、权力的关系密切起来,建筑越来越成为政治性的。空间是权力与知识关系的中介,空间承载着权力关系。

福柯论述了一种微观权力——规训技术同空间的关系。为了控制和使用人的身体,现代社会诞生了一整套以空间规划和控制为基础的规训技术。规训的实施需要对空间进行分配,规定出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种封闭的场所是“贯彻纪律的保护区”,^④如监狱、戒毒所的封闭空间。规训技术还根据需要对空间进行分割、分类、分等。在对空间进行的分割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这种规训空间“其目的是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⑤空间的分配也往往是一

种空间的等级划分。

因此,在规训技术中,建筑空间超越了建筑学的范畴,成了社会控制的权力技术。空间权力的完美载体无疑是边沁式的全景敞视建筑。这种建筑使权力运作自动化、非个性化、匿名化、更轻便、更有效。

4. 城市第三空间

从其第三空间理论出发,苏贾认为,城市空间的生产可以以三种不同但又有关联的方式加以研究。从第一空间的视角来看,城市空间可以作为一套物质化的空间性实践来进行研究。这是一种城市空间的唯物主义方式。从第二空间的视角出发,城市空间则是一种思想性和观念性的领域。

在第三空间视角中,“都市生活的空间特殊性是完全鲜活的空间,是既真实又想象化的,既是事实又很实际,既是结构化个体的位置,又是集体的经验与动机。”^⑥因此,城市空间是开放性的。城市空间的开放性在城市空间的区域性特征中体现出来。区域性意味着城市空间有一种特殊的地理,“这种地理本质上在其疆域中是动态和扩张的……它们不以固有的方式看待都市,而是都市化着。”^⑦在这种都市化中,城市空间充满着中心化与非中心化的反向运动关系。都市化的反向运动赋予都市空间以开放性。

尽管提到了第一空间视角的城市空间唯物主义研究方式,但苏贾以第三空间为理论基础对城市空间的解释给我们的感觉更多是后现代式的,忽视了城市运动的物质生产基础。

作者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 秦开凤

①②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4-105、115页。

③ [法]米歇尔·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

④⑤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60-161、162页。

⑥⑦ Edward W. Soja《后大都市》,李钧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21页。

